

一百个人的十年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现代文学
书 名：一百个人的十年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5-3/127
定价：10.00元

前记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十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三十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的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复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财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十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决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受到可能的麻烦所纠缠，

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露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我、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疯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法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颗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着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耐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启示未来。

写于 1986 年

拾纸救夫

1978年 35岁 男 S省 E市驻军支左人员

1978年 31岁 男 S省 Y县某公社小学语文教师

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为了一个没有出处的革命故事坐了八年牢——拾遍天下纸也要救出丈夫——大火烧死这女人和孩子——从梁上掉下来奇迹才出现——谢觉哉写的《浏阳遇险》——有板有眼地给我叩一个头

那时，我是驻扎×省×部队坦克师二团的一个搞宣传的干部。一九七三年接到上级命令去到鲁西南地区一个县“支左”。这期间社会上的“文革”已经相对平稳，呼杀喊打声稀稀落落，清队的狂潮也过去了。我们的任务大多是解决前五年动乱时期遗留的各种问题。

这个县地处当年水泊梁山的旧址，县招待所传说是宋江的乌龙院，还有一个残破的塔，也是那时遗物。我们“支左”人员总共一百零八员，和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正好巧合。我们笑了，说一百零八将回梁山来了。谁不想看看《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出发时的心情相当愉快。

可没想到，这八百年前草莽英豪奔突出没之地，至今依然十分荒僻。地处黄河边，一片盐碱地。头年大水泛滥留下的淤泥，春天又旱得满地大碎泥片子，柳树芽子没蹿出叶儿就干死在枝上了。真荒凉呀！地貌也不对，完全不是《水浒传》里所描写的崇山峻岭，不过一个个小山包儿。可这里的人还是那股子劲儿，大襟在前头一挽，腰带一扎，怀里揣着狗肉和酒，随便坐在哪儿就吃狗肉，豪饮，性子也很极蛮。有一家子打架，儿子拿铣一下削掉他老爹半个脑袋——我就处理过这事。“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便往死处干了。我们住在县城里，为了工作便利，我作为军代表进了县革委领导班子，临时当一名常委。没过几天，大批含冤告状的就找上门来。有的冤案叫你想都想不出来，过去不是有本《今古奇观》吗？我看有的事完全可以续进去。

一天，我在宿舍里，一个挺瘦的人，戴一副圆眼镜，进门趴在地上就绘我叩头。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你要想给俺解决问题，俺就说；你要也想应付俺，就明说在先，俺扭头就走，这个头就算白给你叩了。”

好一个有性格的人！我说：“每一件事我都会认真对待，怎么能应付你。”

他说：“我这事难办。”

我说：“我不怕难办，只要你说真话。”

他拿一双灰眼珠紧盯着瞅了瞅我，坐在凳上给我讲了一桩旷古罕闻的奇冤。我听罢就知真冤。我必须先讲过这件事才能说为什么真冤——

这人姓李，在离县城三四十里路、紧挨着潘金莲老家的一个公社小学，当语文教师。此人善讲故事；无论听来的还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全能记住，装满一肚子。张口就来，很少重样儿。他属于那种在课堂上随意发挥的老师，课讲得活，趣味横生，学生们都喜欢听他的课。听他讲课时生怕听到下课铃。你知道，小孩子们上学都是最爱听到下课铃的。你想想这人的故事多有魅力！

六五年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也是“文革”的前身了，人们争着要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便回过头来，翻箱倒柜，查找有哪些对毛主席不忠的人和事。反右派时各单位抓右派，都是从上边下比例数的，按人员比例定右派。从那以后，一搞运动，不揪出人算没成绩，渐渐发展得揪出的人愈多成绩愈大，于是学校里就一轰而起找起来，上上下下一同回忆。这位李老师性情急躁，得罪过一些同事。有位教师提出，一次他听李老师讲过，毛主席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趴在水沟里藏身，这是赤裸裸诬蔑毛主席。伟大领袖怎

么会被敌人追得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马上翻遍学生们的书本，查看听课记录，终于在一个学生的语文课本里找到当时听这故事时记下的一行字：“毛主席藏身水沟，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证据确凿，这就以“特大现行反革命案”上报县委。马上县公安局来人把他捕走。他不服呀！他说：“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毛主席胆略过人，机警智谋，我是真心歌颂毛主席呀！再说这故事又不是我瞎编的，是从书上看来的。”公安局叫他说出是哪本书，他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没有根据，就是他编的，这是抵赖和顽抗！很快，很简单，判他八年刑，打入监狱。

他老婆是个乡下女人，跟他结婚一年多，有六个月的身孕，带着大肚子探监时，他跟这乡下女人说：“八年的日子可不算短了，你要受不住，跟俺离了，俺也决不怨你。可是得实话对你说，俺决没坑害你，那故事确实确实是俺从书本上看来的呀……”这女人转身就跑到县里喊冤叫屈。县领导说：“你去找，只要你找到这根据，我们就放人！”

乡下女人心实，把这话揣在肚子里，就四处找开了。这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县城的小书店里除去毛主席著作，别的书全没有；图书馆也封闭了。她找到图书馆员，求他。图书馆员哪有胆量去揭封条，散布封资修呀。他是县城看书最多的人，可他也没读过这么一个故事。这女人就到处去找书，找不到书就拾印字的纸，从纸上找。她不识字，拾到纸便请亲友或小学生给她念，听听有没有那故事。有时拾一块当时印的“文革”小报，也拿去请人看。她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妇女，没文化，哪知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书，文字里究竟都是些什么。当人念到什么科技的、政治的、文化的那些古怪难懂的话，她一动不动站在一边傻听，傻等，等那故事的出现。有人看烦了，草草扫一眼，就说：“没有了。”她也信，再去找。有人劝她：“你靠拣纸，哪能拣到那故事，你又不认字，天底下那么多带字的纸，你哪能都拾来？”可谁也说不动这女人，她依然天天提个破篮子在街上拾。只要发现一块带字的纸，就如获至宝。别人手里有张带字的纸，求不到手，也要请人念给她纸上写着的是什么，人家要是不肯，她就跪下来求人念给她。甚至连在茅房发现一张有字的纸也拣出来，涮干净叫人看。天天拾，天天求人念，天天找不着。天天早上的希望在晚间破灭，但她从不灰心。

她坚信那故事不是她爷们儿编的，坚信早晚一天能找到这个故事。这么久了，自然有点痴痴癫癫。

孩子小时，她背着孩子拾；孩子大了，她领着孩子拾。拾到的纸，不是，就卖掉糊口。

那时，水泊梁山方圆百里的人都见过这么一个带着孩子拾废纸的半疯的女人，都见过她那双总是东张西望却空茫茫的眼睛，都见过她始终提着的那装满烂纸的破草篮，但未必都知道她决非拾纸度日，而是为了一个辉煌的愿望——救夫。

一年到头，春夏秋冬，雨雪风寒，从没有停过一天。心诚未必能感动苍天。她整整拾了七八年纸，可是在她爷们儿刑满前半年的一天夜里，灶膛里的火，引着了堆满屋角的废纸，着了大火。这女人和孩子活活被烧死了。

李老师在狱里听到消息，自己也不想活了，几次自杀都没成。那种县城的监狱一无所有，一是因为穷，二是怕犯人拿什么东西自杀。连吃饭用的碗，使完跟着就要走，怕犯人摔碎后使碗片割脖子。有一次，他去上厕所，看见茅房地上有根麻绳，就拴在房梁上，再两手抓住房梁把身体拉上去，套

住脖子，一松手想吊死。可是麻绳糟了，“啪”地断了，一个马趴摔在地上，摔得他眼冒金星，但当他定住神再瞧，出现了奇迹，有张油印的纸片就在眼前地上，上边正印着要他命的那个故事，简直不可思议！真比小说编的还巧，还绝，这才叫“天无绝人之路”呢。你不信吗？这是真事呀！这纸片破烂不堪，故事断断续续，是：“……追他的人大喊起来：‘跑了，跑了！’……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虽然不全，但是可以拿它证明那故事并非是他编造的了。他拿着这纸片冲出茅房，又喊又叫：“找着文了！我的冤平了！”兴奋地一蹦一蹦，蹿得老高。看守以为他疯了，把他锁进牢房，他捧着那纸片大笑，然后又大哭，肯定想起他白白拾了七八年纸却没等到这一天的那个可怜的乡下女人，还有那糊里糊涂被烧死的儿子。

他写了一份申诉，连同这纸片递上去，心想就等着平反雪冤，出狱了。可没过几天，县里说这纸片是油印品，仍然没来源和出处，不能作为依据，把他的申诉驳回了。但这次他非但没绝望，反而更有信心。有这纸片，迟早会找到这故事。有一阵子，他在监狱里忽然害怕是自己真的记错了，怕这故事并不是看来的，而是谁瞎诌讲绘他的，那就永远无招无对。现在这个可怕的疑心病不再折磨他了。心里有了光。

他来找我今天，是他刑满八年刚被放出来不久，案并没翻。小学校因为他是服过刑的反革命，拒绝他回校工作，没有工资，自然也没有路费去大地方找那本书，那故事。他无家无业，孑然一身。穷得穿一件单褂，经不住春寒，直打哆嗦。

听完他的经历，我说：“你回去吧，这事我可以给你解决。”

他见我这样干脆的回答，不信。仿佛有打发他之嫌，可是他万万没料到，他碰巧了——这故事我读过，我知道在哪本书上。我热乎乎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把压在他背上八年而至今犹在的巨石推掉。

第二天，我到县革委调他的案卷看了。他所说的完全真实，使在县革委会上把事情摆出来。有人说：“这人就是怎么治也治不服他。”

我说：“法律不治人的性格。这故事绝对有，判刑，冤了，一定要平反！”

我是军代表，有权威性，他们不好反驳我，可他们默不作声，不表态。我挺有气，当即要一辆车回部队，把这本书拿来，放在县革委会桌上给他们看——

一本紫红色封皮的革命回忆录，文革前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书名叫作《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打开书，其中一篇就是这故事《浏阳遇险》，作者是谢觉哉。写的是毛主席在一次赴江西根据地途中，路经浏阳，为了摆脱白军追赶，机警地藏身水沟而安然脱险的一段往事。

当时县革委的头头们看着这书都怔住，没话。只有一个自言自语说：“怎么谢老会写这篇东西？”

一个山村教师，就因为讲了这篇歌颂毛主席的故事，被当作反对毛主席而坐牢八年，家破人亡，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罕闻的奇冤？我紧盯住这案子不放松，很快给他平反了结。那天，李老师跑到我家来，趴在地上，又给我叩个头，这个头叩得却是有板有眼呵，如谢救命恩人。我当时倍感惶惑，我不过正巧也看过这故事罢了，我又何德何能接受这个大不幸者叩的这个头呢？我沉默良久，不知讲什么，只说：“是呵，是呵……。”

随后，他请求我把这本致使他妻死子丧、坐牢八年的书送给他。我知道这本书在他生命中的重量，沉甸甸放在他一双颤抖的手中。事后我听说，

他把这本书烧了，将纸灰洒在妻子的坟上。大概企望他那苦命的乡下女人的亡魂从此获得安宁吧！

李老师的冤案一翻，找我告状，求我平反的人，天天堵满我的门口。后来我复员回到老家安徽，省委调我到岳西地区去搞落实政策，真没想到那个小小县城里，冤案也是堆积如山。含冤抱屈的人都是连夜排队找我，从我来到我走，也没间断。而且再没一个和李老师那案子一样容易办。各种稀奇古怪的冤案很难插进手，插进去就把你的手缠住。我才知道，凭我个人力量，无力解决这时代创造的无比巨大的悲剧。我每天只睡几小时的觉，凡可能解决的就决不放过；难以解决的，我回去时一一向省委组织部门作了汇报。

以我的感受，大人物的经历不管多悲惨，也不能和小百姓们相比。大人物的冤枉总容易解决，小百姓们如果没碰对了人，碰巧了机会，也许很难得到命运的晴天，就像梁山的李老师正好碰上我读过使他冤屈的故事那样。我想，至今天下还有多少人含冤未平，无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附件1)《浏阳遇险》

谢觉哉

一九二七年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资格并受湖南省委的委托，到铜鼓去领导驻军起义。一块去的共有三个人，走到浏阳时，被团防军逮捕了。

团防军押着他们走，毛泽东同志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一步一步地拐，落在后面。他掏出一把钱来，对团防军说：“朋友，拿去喝茶吧！”那些人接了钱，他就定。没有走出几丈远，那些人喊起来，其中有一个追到了他跟前，他只得站住，又给守追的人一点钱，并且说：“没有了，朋友，再见吧！”等他定上前面的岭上的时候，追他的那个人才大喊起来：“跑了，跑了！”跟着大队就从他后面追来；毛泽东同志急忙走下岭，躺在一个水沟里。他听见追的人在喊：“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怎么不见了？”到处搜寻，只是没有找到他躺的那个地方。

人声听不见了，他爬起来，徐了些泥在腿上，装作农民的样子，走上一个高岭，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看见有个打柴的，他对打柴的喊：“喂，下面打仗！”“什么事打仗呀？”两个人于是走到一起，交谈起来。谈到农民协会，打柴的说：“农民协会好，只是不该打菩萨！”他回答说：“不错，我就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请救我一救吧！”打柴的很惊讶：“怎么救法？”他说：“这是两块钱，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一块请你买一点饭，并且请你带路，把我送到江西地界，”打柴的说：“可以，你就在这里等着！”

天快黑时，打柴的来了，拿来了草鞋和饭。并且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他哪里梦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

麻烦还并没有完。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市镇，那地方情况也有些紧张了。毛泽东同志没有行李，身上穿一件短褂，一个汗衫，他便把短褂脱下来扎成包袱模样，横背在肩上。每走到一家店门口时，就问：“老板，歇得客吗？”老板眼睛一睁：“歇不得！”连碰了几个钉子。定到街尾最后一家店时，他索性不问了，定进去坐下，大声喊：“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亲何，只得由他住下。第二天，到了准备起义的驻军里，于是轰动世界的湘、赣、

闽、粤的工农革命运动，就从此开始了。
(原载《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

崇拜的代价

1967 年女 21 岁 B 市某大学毕业生

1967 年男 25 岁 B 市作家协会干部

托李敏送给毛主席的生日礼物——在两种崇拜之间痛苦的抉择——一连十天参加他的批斗会——结婚之夜抱头痛哭——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竟然是革命样板戏救我一命——逃离魔掌——崇拜的毁灭和毁灭的崇拜
上部分：崇拜的痛苦

—

我并不怎么钦佩作家，作家们都自我感觉很深刻，但常常会写出很肤浅的话。比如，有位作家写道：崇拜是一种最无私的感情。我料定他根本就没崇拜过谁。

崇拜是把自己掏空了，交给人家。如果人家拿过去随手一扔，或在人家手里丢失了，你呢？你就光剩下一个空壳，整个完了！人生是一次性的。你便永远像个空纸盒那样被遗落在世上，无法挽回。

崇拜是人生顶冒险的事，要拿生命做抵押的。所以，我不大爱看书，宁肯相信自己的人生经验，不信作家们那些假深沉，哎，我这话有没有冒犯你？什么，我说得对？你是说真话吗？反正我顾不上你是真是假，我有话讲给你。

二

我曾经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

不单是我，你去问问我们一代人二十岁时候他崇拜谁？担保会板上钉钉子地告诉你——毛泽东！举个小例子说明那种崇拜有多么纯：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我大学同班。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生日。二十三日晚我们同宿舍九个女同学商量，托李敏送件什么礼物给毛主席。有的说织条大围巾吧，上边绣“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有的说一起用彩色丝线绣束花吧，每人绣一朵，大家叽叽喳喳，兴奋得眼睛直冒光，直议论到十二点多，还是找不到一样礼物能把我们心中一腔火全捧出来。崇拜是很难表达充分的。

李敏说：“我们照张像，再写封信送给爸爸吧。”

大家一同拍手叫好。让毛主席看见我们每一个人，他才会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呢！

第二天下课我们一个个溜出学校到照相馆集合。为了不声张，不把事情闹大，幸福的事也是愈保密愈幸福。照相馆不给照快相，但听说我们这张相片是送给毛主席的，就像接到重大政治任务一样，第二天就洗出来。大家叫我起草给毛主席写信。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几句话写了整整一夜，满地都是写坏的纸团儿。直到把信交给李敏拿去后，我才把更美好、更真切

的话全想起来。

一周后李敏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看见照片很高兴，还指指我说，这姑娘年龄不大嘛！

据李敏说，当时郭沫若去拜寿，毛主席就把这照片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边。无比幸福的感觉呵！真的天天和他老人家在一起了！他天天都会看到我的！我再看教室黑板上面悬挂的毛主席像时，就觉得他那温和慈祥的目光像阳光一样照着我，多大的精神力量！你甭问就知道，我大学时学习成绩为什么一直名列前茅。

三

这期间我还崇拜过另一个人是：他。

那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我们都是派到国棉三厂去搞厂史的学生。去写资本家的发家史和工人的血泪史，加强大脑里阶级斗争这根弦吧！我和他不是在一个学校，我在北师大二年级学化学，他在北大，正经八百学中文的，又是毕业班。他个头不高，穿着朴素整洁，给我的印象是稳当可靠，头脑清楚，清瘦斯文，在我这个理工科学生眼里颇有点文人学士的味道。他是我们这厂史写作组的组长，言语不多却很能体贴人。晚上大家写东西肚子刚有点饿，他不声不响把早准备好吃的东西摆在面前；周末才觉得有点闲，他笑眯眯掏出一叠电影票一人一张。他像个天生的大哥哥。我那时模样很小，人又单纯，为他把我当做小妹妹而快活。可写完厂史，他送我回校，把行李替我扛到宿舍放下肩时，眼神有点特别，忽然说：

“我还能看见你吗？”

我挺奇怪，傻乎乎说：

“怎么不能见呀，随便来嘛。”

我傻吧！这就是当时的我。

可尽管我那时把从书本上看到的爱情，当做迷人却陌生、遥远、与自己无关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人竟然很自如地一步步走进我的心里。

从他谈话中，我知道他很穷。他家在苏北南通，当年陈毅新四军的老根据地，叔叔们都是老地下党，父亲被日寇杀害，母亲守寡把他和几个兄弟姐妹拉扯大，他行老三。从上中学到念大学都靠着国家助学金，一个月十九元六角……他的家史叫我钦敬不已。这家史不但使他特别受重用，一直担任北大留学生的指导员，还使他天经地义构成一个革命青年纯正的抱负和形象。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他把填写的“毕业生志愿书”给我看，都是激奋人心的誓言呵！他要到原始森林，到荒僻的山村，到没有人烟的边疆和草原，去开拓，干一番事业，献出一生，真叫我感动呀。我心里默默地说，你无论去哪儿我都一准跟着你。

真没想到他被分配的地方竟没离开我一步。当他告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井”，我居然不知道王府井：在大西南还是大西北。他笑了，说：“除去北京哪儿还有王府井？”原来他的单位是王府井的中国作家协会。同学们都羡慕他，后来才知道像作家协会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只能派他这样政治可靠、业务优良的学生去。

为了不叫我俩的关系影响自己的学业，我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半个月只见一次面，地点都是在北海。每逢约会，几乎整整一天都在听他说话。他知道的东西那么多，我感觉每次见面自己的知识都在增长，幻想着今后的生活多么充实。我的政治理想、他的形象，全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地融在一起。

我常为自己的幸运而痴醉。

四

我在六六年五月份考完研究生，成绩相当不错，心里挺有把握。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就闹起来，学生们都疯了，喊着“砸烂研究生制度”把老辅仁学校美国教会的大铜盆端到当院，将我们的研究生考卷扔进去烧。我爬在宿舍楼三楼窗台往下看，就像看土改时农民烧地契，心想完了。这突如其来使我发懵。跟着愈闹愈凶，开始把校党委的人一个个揪出来斗。

作家协会那边斗得更凶了。名作家们全成了黑线人物。一般干部也都扯上些问题，只有他政治上干净，革命群众组织还选他当头头，但他也许由于家庭和经历的原故，比较沉稳，依旧那样的斯文气。他再三对我说：“要相信党，靠拢组织，注意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看准大方向，千万别跟着起哄。”不管学校里各种口号怎么有诱惑力，自己思想怎么混乱，只要一见他，立时静了，清晰了。我想，凭着我们的纯正和对党的忠诚，再大风浪也决不会翻船。

大串联时我跑回四川老家，把我和他的事告诉家里，父母都挺高兴。母亲给他买了毛衣、棉毛裤、袜子，还有家乡特产四川桔子，整整装满一小箱子，我便上火车挤了三天三夜，到北京回学校洗了洗，就提着小箱子满心高兴去找他。他要是见到我父母的这些礼物，脸上会怎样笑，我都会想到。

五

在作家协会宿舍楼前，我碰到他北大一个同学。平时见面他总是非常热情，必开玩笑，这次却异乎寻常的冷淡，只说声：“你来了！”就走了。一种出事的感觉就给我了。后来我想，多亏先有这种感觉作为过渡，否则下一幕我绝对接受不了。我敲门。

他一开门，人变了一副样子！那样子——奇怪？可怕？悲惨？疯狂？我描述不准，但强烈地刺激我，至今难忘。他头发蓬乱，满脸横纹，见到我眼泪哗地下来了！然后递给我一张油印的小字报。我只看到：“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反革命分子×××！”这是他呀！别的字怎么也看不清了，头发昏，身子全软了，皮箱“咣”地掉在地上。

隔了一会儿他讲了情况：

他大学时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顺手在书眉上加些感想式的评注，大多是从文学上考虑的，有的注“好，好极了”，有的注“平平”，有的注“不佳”或“错了”。写时没多想，过后便忘了。他同宿舍一位同事翻他的毛主席著作找语录时发现了，在作家协会公布出来。

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事，顿时全沸腾起来……

我听罢，脑子完全乱了。我只想说：“你怎么干出这种事来！”我直瞪着他，恨他！连这句话也没说，忽然提起箱子很坚决地走出他的宿舍——我走！

他跟出来送我，用自行车帮我驮着箱子，从东城走到西城，一路无话。连接我俩的那座无比坚固可靠的桥，一下子从中间断开，两岸中间是汹涌的激流。我在岸这边背过身击，他呢？

他送我到学校门口，对我说：

“我这事犯在毛主席身上，估计没什么希望了。我虽然喜欢你，但我没资格再爱你。咱们算了吧，也不再联系了。你将来不管分配到哪儿去，把地址留给我南通的大哥，行吗……”

他在我面前从来没这样狼狈过，老实说，这几句话我也没听进去，自

已回到宿舍，箱子一撇，一连三天没下床，脑子里全在剧烈地打架。恨他呀！他怎么在毛主席著作里写这些混帐话！这和他平时对我讲的——党如何培养他呀，对毛主席感情如何真挚呀，要一辈子忠贞不渝干好革命文艺工作呀——完全不符合呀。我想，我是不是叫他骗了？迷住了？他是否真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把他两年来对我讲的话翻腾一遍，仔细回忆，琢磨其中是否有对我潜移默化搞反革命的内容，但怎么也想不出来。我真是痛苦极了，难道被他骗得这样的实在和彻底？不，我要去他单位亲自参加他的批判会，听听别人对他怎么看，弄清他的真面目！

第四天我起床去作家协会。

六

当时在我面前摆着两种崇拜：

一是对毛主席的，一是对他的。

对毛主席是对理想偶像、至高无上的崇拜；对他是对一个活生生人、情意相融的崇拜。

但是，对他的崇拜是基于对毛主席的崇拜上，是包括在对毛主席无边无际的崇拜之中。这大关系我心里非常清楚。

具体说，对毛主席的崇拜是无条件的，对他的崇拜是有条件的。如果他真的反对毛主席，我只有毅然决然和他分开。这就是那天我提起箱子决定出他宿舍的原因。可是硬从心里扯出一个血肉相连的人哪有那么容易？可我又怎么解释他做的这件不可饶恕的事呢？

七

作家协会的五层大楼显得高不可攀，外墙上悬挂着要打倒他的巨幅标语。我马上置身一种气势逼人的异样的气氛里。我登上五楼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一连十天，我天天都去。

作家协会的一些人认识我，他们都不理我，却佩服我寻求真理时表现出的执着与虔诚。我静静地坐在会场后排一角，认真听着每一个批判者的发言，还把楼道中所有关于他的大字报全都仔细看过。我发现除去他告诉我的这件事，再没有别的内容。批判者是有道理的，但那些上纲上线、气势汹汹的言辞却不令我信服。在那场合中，我感觉只有我是最神圣的。

批斗后他被挂起来，天天在作协打扫卫生。我没去找过他。因为我还不能判断他，尽管这件事发生在他大学时代，而且只此一桩，但我仍旧拿不准他的本质。深深的苦恼、困惑，以及激烈的情感冲突和思想斗争，使我一时一刻无法安静下来。这问题谁也无法帮我解决，谁也不会为我解决，于是我决定去他老家南通一次，看看他的根儿，是不是也和他对我说的一样。

八

正巧“一月风暴”发生了，学生们都涌向上海串联。我随同学们到上海，借故在上海的姑妈有病留下来，同学们一走，我便买船票去南通。按照他曾经给我的地址，先找到他老家所在的公社。我拿出大串联用的“北师大井岗山红卫兵”的介绍信，说我要了解一个人。没想到他家在当地那么有名。我一提他家，公社干部马上说他家是个革命家庭，父亲因主张抗日被日寇杀害，两个叔叔都是新四军时期资深的地下党员等等。所讲的他告诉我的好比一块版印刷的那样完全相同，我的心便发生了变化。

他大哥就在公社小学教书，我去找他，一望而知是个纯朴老实的人，人比他还瘦，脸形、眼神和有些动作很相像。我不知该说我是谁，大嫂却马

上认出我，因为大哥家有我的照片，对我分外亲热。乡间人的感情实实在在，没法儿挡，只有热乎乎被感动地接受。转天一早，大哥带我去见他母亲。去往他出生长大的那块故土。从公社到他老家还有四十多里地，他大哥骑车驮着我，在水田中间的羊肠小道横横竖竖地穿行，大哥的车术真是高极了，穿呀穿呀终于看到他家。

他母亲大概提前听到信儿了，远远站在几间茅草房前等我。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幕。

他母亲头上梳一个小抓髻，穿着一件阴丹士林蓝布褂子，肥裤子下露着脚脖子，一双小脚，瘦高瘦高，直立着，脸颊的皱纹一条条像雕刻上去的。我应该叫她什么呢？未及细想，情不自禁叫她一声：“妈妈！”

老太太两只瘦长的手伸上来，直抖呀，把我从头一直摸到脚。心疼我呵！她五个孩子中只有他一个出息了，还到北京那么个大城市上大学，工作……但她哪里知道儿子成了反革命？我当然不敢讲，只说他忙，托我回来看看。

老太太把他兄弟姐妹都从别的地方叫来，杀一只鸡。村里有点消息就像阵风霎时吹遍，男女老少，抱孩子，拄拐杖全来看我这个“没过门的媳妇自己找上门来”。这里方圆百里，大概还没有过北京来的女大学生呢。大家因着我看呀，笑呀，问话呀，这时我已经觉得自己是他家的人了。当晚，他母亲几乎搂了我一夜，喋喋不休讲了他小时候所有的事，在母亲嘴里，孩子任何一个细节都裹着浓厚的情感……不知不觉，他这样的“反革命”我不信了。转天告别时，他母亲送给我一小袋子花生。我提着这袋子回上海，没停，马上返回北京，去找他。当我把这一小土布袋花生放在他面前，他多么聪明，什么都猜着了。他哭了，觉得对不起把他拉扯成人的苦命的老母亲。他从来没有这样让人可怜。

这样，我不但决定和他恢复关系，而且坚定地往前迈一大步，我们结婚了。

这是六七年十二月一日。

我的新婚之夜不叫新婚之夜，整整一夜我俩抱头痛哭……。

九

婚后，学校把我分配到燕北。但山西武斗不能去报到，闲在家中。他的问题看来得等“运动后期解决”了。文革像迷了路，愈来愈没有尽头，那一阵子挺茫然。一天，我去科学院学部看大字报，正是杨成武“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口号出来，到处都是这内容的大标语。那天不知为什么总感觉特别紧张，好像要出事。回到家等到天黑也不见他回来，忽然门“哐当”打开，作协造反团的两个人押他进来，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还要查查他的书。”这就抄家，把书架上的毛主席著作全抱走，又对我说：“这段时间他不回来了，明天早上开他的批斗会。”说完就把他带走。我坐在床上傻了，追也没追，一种大难临头的味道这次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还真的觉得他这一走，完了。小屋变得又大又空，我坐了一夜，挨到天亮去作家协会。

我登上五楼，坐在会议室参加他的批斗会。由于杨成武的讲话很极端，批斗的气氛就不同以往，我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心为了确认他是不是“反革命”。我是来陪他的。我是想叫他看见我便感到不孤单，我在和他一起承受……在批斗会上，轰轰烈烈的叫喊声一点儿也听不进耳朵，心里乱成一团。批斗结束后，我被作协造反团叫到另一间屋谈话，他们还把我同班同学们叫来，

要给我做工作。我下定决心一句话不说。

就在这时，忽听外边走廊人声嘈杂，脚步很乱，好像突然发生什么事。我脑子下意识响起一个声音：“坏了！跳楼！”不由自主猛地从沙发跳起来要夺门而出。马上几个人堵在门口不叫我出去。谁也没告我什么事，我像断然什么都知道了，木头一样戳着不动。大约二十分钟后，会议室那边批斗会又开始，却变成一种声讨会了。阵阵加剧的呼口号声竟然变得忽高忽低，忽远忽近，一会儿如雷炸脑，一会儿隐隐约约很遥远，这时我已经没感觉了，麻木了，脑子完全停顿，不会哭，不会笑，什么也不会。

只见进来一帮人围着我说话，谁也不直说，作协那些人多鬼，谁都怕把我刺激疯了担责任，绕着弯子做开导工作。我毫无反应，只见许多双眼直对着我，许多嘴巴在动。恐怕这是人将死时的一种感觉吧。

当天他们不叫我回家，把我弄到一位老作家的爱人家里。这女人和老作家划清界线，家里只有她和一个女儿，作家协会还加派一个女干部陪我，大概怕我出事。其实我不会出事，因为我像傻子一样已经什么都不懂了。不会思维，不知道时间，连他死没死的概念也没有，恍惚只觉得自己是个动一动都很困难的肉体。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五楼窗户跳下去的，摔得血肉模糊，许多骨头都断了，很惨。他出身好，政治上一直受优待，受不了这种歧视和委屈，尤其是自尊心承受不了，只有走自杀这条路了。作协打电报叫他哥哥来处理，他哥哥却不想见他尸体，怕受不了。丧事处理完，已经半个月过去，他哥哥来看我。

那天的感觉异常奇特。我正浑浑沌沌之中，一见大哥，好像突然受到一种刺激，半个月的恍惚一扫而光，一切细节都清清楚楚地一齐涌来，我异常的清醒，非凡的明白，死而复生，感觉很振奋那样，却一下子扑上去抱着大哥大哭。我明明白白他确实没有了。

大哥好像瘦多了，皮包骨头，眼睛显得大大的，眼泪哗哗流，眼神和他一样。忽然我感觉他留给我的种种眼神唰唰地往大哥的眼睛上重叠，这一瞬间，我没疯了就算福气；当然，我要是真疯了就不见得再经受以后那些罪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把家拆了，家俱物品、锅盆碗筷，所有东西全廉价卖掉。他是反革命畏罪自杀，没有丧葬费，大哥靠工分吃饭，也没有返回去的路费。我分给大哥一半钱，挥泪而别。我当时急渴渴只想摆脱，摆脱北京，摆脱他死的地方，摆脱这一切，摆脱得愈干净利索愈快愈好。这就背起行李卷儿，孑然一身，去往一无所知的燕北。

下部分：崇拜的回报

十

生活给我的第一个教训是：天真比愚蠢更愚蠢。

我到达大同的燕北专署报到后，知道自己被分配到山阴县第一中学教书，立刻对管分配的一位处长说：“我发生了一些事，不能当老师。”跟着就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说了。这也是我多年受党教育的结果——有事不能瞒骗组织，只有对组织说清自己才感到轻松坦然。我上午说过，下午就觉得空气凝固了。来到燕北报到的各地大学生都像看稀奇动物一样看我。

有的扭过脸嘁嘁嚓嚓议论，我感到一种威胁压来，低头回到招待所，同屋一个三十多岁挺爽快的当地女人问我：“你爱人死了？”我惊奇地问她怎

么知道的，她说中午时专署那位处长把待分配的各地大学生都召集起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要大家警惕我，注意我的行动。他把我向组织汇报的话全兜出来了。

我便不敢出屋，躺在床上仰面瞧着屋顶，饭也不吃，心想我这辈子全完了，我才二十一岁呀！

第二天一早，我想再找那处长谈谈，一出招待所大门，一个小姑娘就朝我尖声叫：“反革命！反革命！小寡妇！小寡妇！”

这就促使我对燕北专署不辞而别。我脑袋一热买票去到西安姐姐家。一见到姐姐那张标准的党员面孔就懊悔不该来。我只说山西武斗没处报到，便来看她。姐姐天天上班，我就在街头漫无目的地乱走一气，直到把身上钱花光，茫茫站在西安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心想哪里是我的去处？四川父母那里，不行，父亲是石油工程师也在挨整，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再加给他们。我耳边忽然响起他大哥离开北京时说过的一句话：

“你要是实在受不住时就来吧，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我便卖掉身上唯一值钱的手表，换了七十元，买张去南通的车票。在火车站我给姐姐写封信，把我的一切遭遇装在信封寄给她。

过后姐姐写信说，她看见信哭了一夜，怨怪我把最需要安慰的机会没有给她……

十一

我到达大哥家时，他母亲正住在那里，听说我来了，从屋里跑出来，长长瘦瘦的者太太，飘着满头白发，一双小脚迈着很大的步子，跑得太急，忽然绊倒，摔了一身土。我扑过去抱住她，娘俩互相紧抓着对方后背失声痛哭。我们共同失去一个人，但此刻好像失去双倍的亲人呵。

大哥说：“你要愿意在这儿，咱就苦在一块儿吧！”

这样，我便随母亲住到乡下。

一住进曾经生他养他那几间茅草屋，就有种小鸟回巢、游子归家的安定感觉。我想，工资、工作、大学生的待遇全不要了。死也死在这里了。我天天跟随乡亲们干活，锄草耙地收麦子，也不要工分。我和他母亲在一起时，常常有种他并没死的错觉，觉得我就是他，这错觉给我很大的安慰。乡亲们都很亲近。他们模模糊糊知道一些事，但从不问我。我便像在狂风恶浪出生入死地挣扎过后，躺在沙滩晒太阳一样，出奇的宁静，无限的宽解。有时痴望着苏北烟云雨树，水田中淡淡的倒影，大片大片浓得化不开的鲜黄的油菜花，我会幻想出他童年骑在水牛背上和少年在田埂中玩耍的身影……

这期间，燕北专署发现我失踪，到处打听我，电话打到北京、西安、四川，最后知道我在南通，就一封封信催逼我回去，直到寄来最后通牒。我原想抱定宗旨不去，但不久，农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公安六条》下来，我算反革命家属，属于管制对象，情况变得紧急。一天夜里，大哥从公社骑车风风火火跑来说，村干部告诉他：“你弟妹是逃亡的反革命家属，明天早上要斗她，你快转移她吧！”

母亲发火了，她的脸颊直抖说：“他们要把她怎么样？先把我老命要去！”死活不叫我走。

我想，不行！这时候，他两个叔叔都被打成“叛徒”，家里的情况不妙。再说农村斗人很野，动不动乱棒齐下。我又怕回燕北，怕那位处长，怕那些眼神。整个世界都在逼我，我已经没有出路了，便想到死。干脆就找他去吧！

最无妨碍的去处，只有死亡。但我决不能死在他家，决心下定，我就说我先回上海暂避一时，母亲才答应。

当夜大哥骑车驮我走，为了怕人瞧见，在漆黑的田野里绕来绕去，天亮才到达南通码头。分手时大哥发现我什么东西都没带，他哪里知道我永诀人间的决心。人本来空手而来，空手而去，什么也不需要。

我清清爽爽上了船。

十二

一个人只有要死的时候，才更有求生的欲望。当船行海上，我在滑溜的甲板上徘徊，那天天空特别暗，大雾浓得几乎船都钻不出去，看不见远处的海水，只有偶尔看到对方开来的模模糊糊、鸣着船笛的大船影，还有海鸥突然一闪就消失在湿漉漉的海雾里……

愈是没有出路，愈想找到一条出路。我甚至憎恨自己惧怕自杀的怯弱。在一阵阵死的念头愈来愈强烈地袭来时，我突然听到船上扩音喇叭播放的样板戏《白毛女》中的一句唱词：“我、不、死！我——要——活！”一个个字吐字特别尖利，特别清晰，猛地刺激了我；我忽然想到，白毛女遭受到那么大屈辱，在深山丛林中吃野果子也还要活，我为什么非要死？陡然我浑身都响着这三个字：

“我——要——活！”

虽然我不知自己为什么非活不可，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求生”两个字本身那么大的鼓舞。我冲动，我激昂，我混乱，也茫然，糊里糊涂到上海站了。被人群挤来挤去挤下了船，回到上海，回到了人间。

我这个文革的受难者，反而被样板戏——这个文革文艺怪胎救了，多荒诞！

崇拜吗？这时对于我已经是个很模糊的东西了。

十三

到达大同专署后，作为惩罚，他们把我分配到燕北最最苦的一个地方——0县当教师。

0县非常封闭。愈封闭，消息传播愈快。我一到那里，我的事在县城几乎家喻户晓。定在街上都有些破衣烂衫的人指指点点议论我。县军管会政工组对我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你的问题，你去丁家窑公社教中学。记着，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许乱说乱动，有事外出必须向我们请假。”我对这种话已不再感到压力，麻木地点头称是。

第二天，我乘坐丁家窑供销社一辆拉东西的大车去学校报到。这种大车每两天由丁家窑来一次，送来山民们挖的草根和农产品，再带一些可怜巴巴的生活必需品回去。我把行李扔在车上，跳上去。车子一出县城，哎呀，真是美极了的一天。

这地区处在山西和内蒙交界，全是平缓又单调的丘陵。没有路，只有大车轮轳轧过草地两条浅色的印子。赶车的老汉和我言语不大相通，很少说话，七八十里的路程中几乎看不见一个人，有时觉得只有自己和自己。又大，又空，又静，又舒服，脱离人世其实并不寂寞；前头是三匹马和老汉的背影，左右是对我绝无伤害的大自然，长长的草叶刷着大车嚓嚓响得很好听。在车子晃晃悠悠中，我便不自觉唱起歌来，唱完一个再唱一个，把我所有会的歌全唱过来，无忧无虑唱了一路……我尽量什么也不想，享受这一切。真恨不得这条路没完没了，一直走下去，几万里，几十年。

下午五六点钟到达一个山坳里。赶车老汉说到了，我大吃一惊。黑蒙蒙大山影中只有孤零零两排空砖房，周围没有村庄。没等我问，赶车老汉说：“这是学校了。”就把我交给一个又聋又哑的老头。这老头给我拉风箱蒸几个土豆，一碗盐水，便是伙食，然后领我到一间阴冷的小房里叫我住下。这里没有校长老师，也没有一个学生，哪里叫学校？我惊愕又惶然，好像进了迷宫。当晚在空山空屋里，我害怕极了，白天脱离人世的快感全没了，我十分需要一个女人，我跑去拍那老头的门，说我要找个女人说话，无论我怎么叫喊，用手比划，但他又聋又哑，只摇手，不懂。

都说地狱十八层，我现在哪一层，是不是到最底下一层了？我整夜心里在叫——生活呵，你到底还有什么更糟的，先把最糟的叫我尝受行吗？

十四

我住的这里是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占前一排房，只有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一位秘书、一个抓药和送信的通讯员、一个兽医，再一个就是那聋哑伙夫，大都是老头。后一排房是学校，公社准备办个中学，从各村小学招收学生，但当时闹文革，孩子们都无心上学，所以房子全空着。革委会主任说：“你自己到各村去动员吧，动员来一个就教一个，没有学生来你就没事儿。”他见我很难，便说，“你去胡柴沟找一位联区校长，他姓王，他说咋办就咋办吧。”

我心想找到这位王校长就找到明白人了，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摸到胡柴沟，一见这位王校长，心里的感觉马上改变。他个子很矮，下巴满是胡茬，两眼凶凶瞪着我，好像对我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有种透入骨干里的仇恨，先给我一个下马威说：

“你的情况我早听说了。你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捎带办一所中学，自己去动员学生。”

除此他二话没有，似乎看我一事无成才好。这么大的公社我怎么去动员学生？幸亏公社秘书热心，撕块纸，拿笔划个草图，我就按这图在完全陌生的荒野荒村中像个流浪乞丐，挨个村子串，上门动员。没等我动员来一个学生，县里忽来紧急通知，全县六百多教师立刻都集中到县里办学习班，搞清理阶级队伍。灾难又要迎头重来。

十五

清队运动来势凶猛，我大概很难逃过这一关，索性去找县武装部政委，他直接管教育系统的运动。我从头到尾把我的事说一遍。这次不同于在燕北专署那次天真地向组织交心，而是很清楚自己处在任人宰割的境地，反而无所畏惧，索性好歹全兜给他了，要整死我最好快一点。出乎意料地是他眼里流露出这世上难得的同情。我便问他：“我这些事在学习班里该不该谈？”

他说：“这不是你个人问题，可以谈，也可以不谈，但谈不谈都和我们县没直接关系。”

我明白，他不能不这样说，实际上是暗示我可以不说。有这个大人物的态度，我心里轻松多了。但到了学习班如进了绞肉机，我不说那王校长总拿话敲打我，尤其整别人时，打得很凶，故意做给我看，吓我。我想，再不能吃天真和认真的苦头了，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这种穷乡僻壤斗起人来比大城市野蛮得多。有时把县长、县委书记们弄来批斗，用铁丝拴上几十斤的大粪桶接在脖子上，一边斗还一边往桶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